

法国民议会 德姆维尔谈美国在越南的失败

【本刊讯】瑞士《日内瓦论坛报》四月五日刊登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顾夫·德姆维尔对记者谈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姆维尔，星期五在答《日内瓦论坛报》记者问时说，美国政策在越南的失败，可能使美国回到现实主义而不是孤立主义。他又说：“在华盛顿着手缩减它的军事预算之日，恐怕才会回到孤立主义。但是这一天看来还未到来。”

这位前总理认为，越南目前的事态发展，是该国二十年来——即美国干涉以来——的历史上的一个也许是决定性的转折。德姆维尔

说：“之所以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的失败，美国进行的政治的、然后是军事的干涉，其目的都是要在反共斗争的幌子下，把南越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美国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实际上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各邻国也将立即如此。我个人相信另外一种多米诺骨牌理论，即当一个西方国家——这里指美国——以此为借口干涉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便变成共产主义的了，因为共产党在进行战斗具有反对外国干涉的民族运动的外貌。这正是在南越和柬埔寨发生的事，这也是可能性的转折。德姆维尔在泰国发生的事。”

虽然德姆维尔认为两个越南重新统一是可能的，可是，他并不认为德国、朝鲜所实行的分治办法会自动地受到损害。

美国的失败必然是基辛格的失败，它也是巴黎协定的失败，巴黎协定从未执行过，因为，一方面从来未举行过政治谈判，而这本来应是停火的正常结果的。德姆维尔认为，继续发生冲突应归咎于双方。至于阮文绍继续担任西贡政府首脑一事，这是举行政治谈判的障碍，因为这位南越总统从来未同意建立“第三力量”。

他说：“我不知道美国外交界是否能、或是否愿意强迫阮文绍行事。我所知道的是，美

国在越南政策的失败是一个对美国的威望和信用有坏影响的心理现象。然而，如果华盛顿从越南的经验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即不要在不关什么地方、不管怎样、不管什么代价进行干涉了，那么，这一失败也可能标志着一个演变。那么，这将是回到良知，而不是回到孤立主义。”

德姆维尔强调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在有正当理由时，即有民族利益的理由时，才能从事战争。从这一观点看来，是不能把越南和欧洲相比的。越南那里根本不影响美国的任何民族利益，而在欧洲，则与美国的利益有很大关系，因为世界的平衡取决于西欧的命运。”

【本刊讯】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三月号刊登日本东京外语大学副教授中嶋岭雄写的一篇访问中苏蒙的观感，题目是《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全文共分五部分，以下是该文的详细摘要：

中嶋岭雄访问
中苏蒙的观感

《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

一、纵贯三都所感

作为国外学术调查计划的一环，去年十二月下旬我只身离开日本，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在苏联、蒙古和中国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各逗留了约一周，在今年一月中旬刚刚回国。这次旅行也是为了证实我本人的关于“中苏对立的历史结构”的研究课题。所以，能在同一时期访问这三个国家，自然是一个例外的幸运。

我的感想之一就是，在同一时期访问这三个国家，而且，它们同是社会主义，但差别却太大了。另一方面，这些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平等乃至划一倾向所带来的各种矛盾、某种意义上的表面平等实际不平等的矛盾和一些阶层享有特权的问题上，正在暴露出它们有共同性。这一点在宣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国社会仿佛也不例外。似乎可以说，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才提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批林批孔”运动的确没有成为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狂热的群众运动。

社会主义社会的上述现实使我感到，欧亚大陆的这三个社会主义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和生活上是很严峻的，作为一个旅行者，我感到紧张和拘束。

我的另一个大感触是，关于作为形成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主体的俄罗斯民族、蒙古民族和汉族民族这些都给世界的历史留下了巨大足迹的三个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性和它们所固有的文明差

异，以及它们之间民族的、文明的摩擦之大这一问题。而且我感觉到，具有这种差异的三个民族国家纵贯欧亚大陆而并存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我们日本人难以理解的。

拿汉族民族来说，它经常感到的是强大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存在同蒙古帝国的形象复合在一起的“北方的威胁”。而俄罗斯民族，为了避免“来自东南的威胁”，已培植起不希望坚强统一的汉族民族国家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

第二个问题仍然是关于作为中苏两国的中间地带的蒙古民族的居住空间问题。这一点特别是就这个蒙古民族的广阔的居住空间在历史上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所具有的意义而言的。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形成了被限制在所谓外蒙古的土地上的主权国家的蒙古，从辛亥革命时期发表独立宣言的时代，经过一九二一年的蒙古革命，直到中苏对立的今天，经常要为中苏双方的利害作出牺牲，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如此这般的蒙古世界，连绵不断的无边无垠的戈壁沙漠和草原地区，虽说是边境却没有界限；它是专门骑马游牧的民族自由移动的空间，同时，又作为中间地带而一直存在着。围绕着这一不稳定的中间地带的宗主权，中苏两国目前进行着自辛亥革命时期以来就未曾停止过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想，到人民革命在中国胜利的时候，外蒙古将会自动地成为中华联盟的一部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段话直到今天仍强烈地刺激着蒙古方面和苏联。围绕外蒙古的宗主权的问题，经过一九四五年的雅尔塔密约、同一年斯大林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

【时事社东京四月七日电】
题：栗野大使向外相作回国报告
告：本周内将完全包围金边

因柬埔寨战局恶化，驻金边的日本大使馆暂时关闭。在六日夜回到了国内的驻柬大使栗野，七日上午十点多在外务省会晤官泽外相，就当地的局势及和平谈判的前景等问题向外相作了报告。

在此之后，这位大使会见了记者，讲述了他对当地紧迫局势的估计。他说：“在本周内，柬埔寨首都金边将完全被解放军包围。但是，因为金边是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解放力量方面可能不会采取大攻势。波成东机场也许会被占领。”这位大使的谈话如下：

一、在柬埔寨的城市里，政府军溃散士兵的抢劫事件等日益增多。现在，大使馆工作人员在路上就看到过这类事件。二百万市民约有一半被迫成为难民或者接近于难民的状况。营养失调的儿童也几乎到处可见。总之，市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

二、我同东盟各国大使采取共同步调，在朗诺总统出国时与柬埔寨首脑进行了协商，其意图是在如下的共同认识上产生的：从都是亚洲人这种整体感出发，谋求越过意识形态的不同找出某种解决办法。

时事社报道《栗野大使报告》 本周内将完全包围金边》

友好同盟条约、一九五〇年斯大林和毛泽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一九五四年

赫鲁晓夫访华时举行的中苏会谈，始终是中苏双方的争执点，至今台湾政权仍然继续主张它对蒙古拥有主权。这样，现代蒙古不仅是处于中苏两国峡谷间的国家，而且正由于这一中间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极其不稳的，所以它宛如一块铺在汉族这个巨人和俄罗斯民族这个巨人之间的地毯一直存在着。今天，苏联把这块地毯完全拉到了自己一边，所以中国的反击已经加强。

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一直存在的这种国际关系，轻易地抛弃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直至今日。可以说，今天的中苏关系和中蒙关系是这种历史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二、苏联的社会潮流

在这一点上，我相隔四年半去访问的苏联使我感到，苏联不待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的最先进国家，可是其民意似乎更加倾向于所谓西方化。尤其是对于物质财富的丰饶和高水平的消费生活的憧憬，似乎已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而在我们先进工业民主主义国家的内部，物质财富的丰饶和高水平的消费生活则正在成为批判的对象。

在这一点上，如同可口可乐“侵入”东欧各国是这些国家西方化的一个标志那样，苏联当局去年允许进口美国口香糖这件事情，难道不会在将来意外地具有重大的意义吗？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用不着碰到不正当的美元黑市买卖就可以立刻明显地看出：卢布实际上是多么疲软；由于在白桦商店——专对外国人营业的美元商店——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到高级商品，普通老百姓是多么想弄到美元。（下转第四版）

福特重申美正在重新估计对外政策

说「美国的敌人不要错误估计美情绪，断定向美挑战的时候已到」

【美新处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四月七日电】福特总统今天在对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发表讲话时强调，美国将继续对越南战争中受害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他谈到美国“决心”进行救济工作。

他说：“为了我们自己的自我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遵守我们的基本的做人标准，我们将继续帮助不那么幸运的国度的人。我们将以一切适当的方式帮助东南亚的受害者。我们将不背弃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其他的人。”

他说：“诚然，美国在国内外都遭受了挫折，但是美国人保持自信心和正确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现在是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和我们的最大能力的时候了。”

福特指出：“我们正在重新估计我们的对外政策。”但是他提醒说：“美国的任何潜在的敌人都不要愚蠢地错误估计美国的情绪，断定向美挑战的时候已经到了。任何盟国或友邦都不要担心我们不会履行我们的义务。”

总统还谈到全世界在各国越来越相互依靠的时代继续得到的增长和发展。他说：“在我的这一届政府期间，美国将既不脱离世界，也不放弃同一切国家人民建立和平和建设性的关系的希望。”

曼斯菲尔德的谈话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七日电】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要求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世界范围的重新估计。

曼斯菲尔德在一次谈话中说：“除非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军事干涉应成为一项过去的政策，并且只有在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进行适当的磋商之后才能实行。”

曼斯菲尔德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根据现在的情况而不是过去的情况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了，我们应该修改和审查我们在全世界的防务安排了。”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二十九日晚刊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江川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莫斯科的青年也感到厌倦》，全文如下：

（原按语：在弥漫香烟烟雾的大厅里，荡漾着西方电影的主题乐曲，无数对青年男女拥挤在一齐跳舞，这就是莫斯科之夜的酒吧间。这里反映出在缓和紧张局势的状况下空前强烈地接受了西方影响，在物质享受上也呈现富裕的社会里所培育出来的不懂什么是革命与战争的新型的苏联青年的一个侧面。表现出在和平时代共同的特征——厌倦与无所关心、无休止地膨胀的欲望……）

星期六晚九时许进入莫斯科最现代化的大街加里宁大街的酒吧间——吹雪。一推门，里面响彻着电子吉他的演奏声。灯光微暗，烟雾弥漫。

在这种气氛中，青年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跳舞。台桌约占据了大厅的三分之二，剩下的场地是留给跳舞用的。舞曲一响都站起来跳舞，到下一个曲子响起来又去跳舞。

节奏快的乐曲固然受到喜爱，但是，《日瓦戈医生》、《教父》、《男人和女人》等西方电影的主题乐曲也大受欢迎。

青年们都各自煞费苦心地尽情打扮，有的穿着超长裙，有的穿着超短裙，有的穿着牛仔褲。

近数年来，苏联明显的巨大变化

《尽管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莫斯科还是坚持缓和》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七日刊登克里斯托弗·雷恩的一篇新闻分析，题为《尽管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莫斯科还是坚持搞缓和》，摘要如下：

尽管在印度支那、中东和葡萄牙、对外事务上的趋势现在显然变得有利于莫斯科，可是苏联对外政策方面压倒一切的论调仍是主张搞缓和。

克里姆林宫对西方挫折的初步反应是默不作声，一些外国外交官已断定，俄国人对于苏联政策意外获得的好处本来并没有完全作好准备。

莫斯科现在必定在盘算如何夺得短期的好处而又不损害同美国和解的长远目标。

共产党在柬埔寨和南越的攻势取得的成功似乎证明它这些年来在武器和物资方面进行的投资还是对的。

然而，正如一位俄国人不久前所指出的，“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次付出过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他解释说中国最终很可能会影响这个地区的政局。

此外，同中国人形成对照的是，在支持柬埔寨叛军方面，俄国人被认为是姗姗来迟的。这些因素将不利于莫斯科实现组织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希望，这个体系是用来孤立中国的。

苏联搞缓和的主张是四年前苏共二十四大提出来的，两周前苏共首脑勃列日涅夫在布达佩斯的一次讲话中再次保证要实行这一主张。一方面很难指望俄国人会放过他们要抓住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已花了很大功夫保持缓和的势头，以减少核对抗的危险，不断吸引西方提供它所希望的技术，呈现出苏联在欧洲和别的地方负责任的形象。

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重新考虑，克里姆林宫显然宁愿在敏感地区不出头露面，同时在同西方直接对话方面大显身手。

苏联的言论表明，今年莫斯科的一个重大目标仍然是在勃列日涅夫和福特总统去年十一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迅速达成初步协定之后，同华盛顿定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限制进攻

性核武器的办法。

正如勃列日涅夫在他同西方其他最高级人士进行的会晤中所强调的那样，西欧在苏联的缓和前景中也占重要地位。莫斯科眼前的目标是要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来结束日内瓦的三十五国欧安会。

苏联领导人似乎希望，今夏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光辉会使得他们在实际上已陷于僵局的维也纳中欧裁军会议上的信用进一步提高。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使中东双方军队进一步脱离接触而作的努力最近遭到失败。苏联领导人并未掩盖他们对此感到高兴的心情，虽然看来他们并不指望基辛格的逐步解决垮得那么快。下一个行动要由莫斯科来采取。它一直在

力促恢复日内瓦和会，作为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最好途径。

据认为，苏联领导人现在在乞求人们支持这次会议。但是这里的外交官们认为，这已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在日内瓦的任何成就都会提高苏联在中东的威信，但是在日内瓦的失败，或者即使陷入僵局也能使苏联狼狈不堪。

莫斯科的耐心在它同北京的关系中仍然受到最为严厉的考验。边界谈判仍然陷于僵局。中国仍然扣留着一年多前误入边界的一架苏联直升飞机及机上人员。

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说，必须使缓和成为“不可逆转”，但是苏联从来也没有完全清楚地表明过，勃列日涅夫到底准备为缓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时事社报道

《苏在勘察加东方海域进行射击演习》

【时事社东京四月三日电】题：苏联在勘察加半岛东方海域每日从下午三时起到第二天上午十时止进行射击演习，规定该海域为危险区。

外务省四日宣布，苏联政府二日通知说，

——单是被赶出酒吧是完不了事的。

“最近，在餐厅里喝了个酩酊大醉，吵闹了一番。立即被警察抓住送进拘留所，关压了十天。把我送进十来个人一间的房子里，就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白天叫我们干活，扫马路上的雪，多是又脏又累的活，不过，由于今年冬暖雪少，所以让我们到工厂去劳动。原来的工作岗位当然把我开除了。可是，用不着担心，因为，只要看一看贴在街口上的招工广告，工作是多得很的。”

监视年轻人的便衣警察，坐在能看到整个房间的最好座位上。象顾客一样刁着烟斗，但掩盖不住那种不合群的样子，你一看就知道那是警察。

几乎没有中年以上的顾客。他们认为还是餐厅比这些地方好。一位从哈萨克共和国中苏边境工作回来休假的三十六岁的少校说：“到了这里才感到年龄大了。无论如何跟他们也合不来。”他也不跳舞，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乍一看倒是热闹，可是莫斯科在某种冷寞的气氛中，渐渐进入深夜。

只综合聚集在酒吧间里那一伙年轻人说的话，就要得出一个现在苏联青年的形象，那恐怕是勉强的。肯定还会有很多更禁欲而且忠实于国家理想的青年。但是，酒吧间的这伙年轻人，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日报报道《莫斯科的青年也感到厌倦》

说现在的苏联青年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战争；对苏联社会来说，他们是未知数的一代

是轿车增加了，人们的服装大大改善了。不少青年人穿着合身的西服。如果说花上衣、喇叭裤是时髦的一个方面，那么，所谓留须、长发的嬉皮士也颇受欢迎。

然而，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年轻人仿佛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欢畅。在马路上偶然相遇询问他们时，一个留着胡子的青年人说：“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电影虽然不少，但都很无聊，呆在家里也没意思。”

今年，正值战胜纳粹德国三十周年，宣传机关展开了一个大肆宣传的运动。但是，生长在七十年代和平时期的苏联青年却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战争。对苏联社会来说，他们是未知数的一代。在自由自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同世界也是相同的。

二十三、四岁的女大学生回答说：“除了政治以外，我对什么都感兴趣。”“在公寓里有我自己的房间、电话和有立体音乐电唱机，所需要的东西大体上都有。结婚？和别人同居了两年，后来又吹了。

还是一个人快活，但也并不是没有不满的地方。总有一种想要强烈抗议的心情，要抗议什么，却不太清楚……”

本来，在苏联是不容许存在反体制的学生运动的。不满的实质是什么尚不清楚。但是，苏联也有年轻人早期成熟这种在和平时代中共有的现象，这也导致了产生世代之间的断层。

譬如，苏联没有禁止未成年人饮酒和吸烟的法律。在十年制的义务教育中，学会喝酒抽烟的人多起来了。女青年抽烟亦不稀奇。我曾在机场上看到，一位上年纪的妇女指着一群在一块抽烟的年轻女职员痛心地说：“看这些姑娘在干些什么！”据说，年轻一代在两性关系的道德方面，也变得更为开放了。

聚集在酒吧间的年轻人都安静地，不大吵大闹地拼命跳舞。这也因为不卖给他们伏特加、白兰地等烈酒。然而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谁都知道，一旦大吵大闹起来——在俄国是指闹到推翻桌子的程度

日本《读卖新闻》评越南局势文章

《解放力量以“政治胜利”为目标》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三日登载记者永井写的一篇述评，题目是《解放力量以“政治胜利”为目标》，摘要如下：

越南解放力量迫使南越政府军面临崩溃，震撼了阮文绍政权支柱的强大攻势，当然是很久以前就悉心研究出来的战略。但是，解放力量的战略目标不在于单纯的军事胜利，而是以军事、政治、外交攻势为三位一体的。换句话说，这次军事攻势包含有重大的政治目标。

去年十月八日，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发表了“打倒阮文绍政权”的声明。从那时以来，打倒阮文绍政权的号召日益响亮，发出了“同打倒阮文绍政权以后的新政权开始谈判”的呼吁。不用说，七三年一月的和平协定是以阮文绍政权为谈判对手而成立的，而不到两年就有了这样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了。

巴黎和平协定有两个主要内容，即“停火，撤出美军”和“越南内部的政治解决”。第一个，撤出美军已经实现，停火的方式也大

体建立起来了。总之，解放力量现在已取得了“赶走美帝国主义”的巨大胜利。第二个，即政治解决，众所周知，只不过是举行了形式上的军事、政治协商而已，而且已陷于中断。

然而，解放力量同赶走美军一样地重视第二点，即“政治解决”。因为解放力量相信，只要沿着和平协定所规定的“成立由西贡、临时革命政府、第三势力三方组成的民族和解委员会，进行大选”的过程去作，自己

必定会取得胜利。的确，解放力量方面上自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下至一个普通战士都感到“时间对我们有利”。解放力量方面每有机会就呼吁“要严格遵守和平协定”也是因为“能够取胜的政治解决”已被推迟。解放力量看到，这样下去是不会遵守协定的，于是决定改变了战略。

从这个基本战略来看，可以推断政治、军事的下一步作法将是：首先在政治方面，解放力量认为，阮文绍政权

外电报道越驻法大使同法总统府秘书长会谈

杨文明要法帮助谈判解决南越问题，法表示愿作“诚实掮客”

【美联社巴黎四月七日电】北越驻巴黎大使今天去爱丽舍宫进行了一次交谈，这可能是法国在南越提出和平倡议的一部分。

武文充会晤了法国总统府秘书长克洛德·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但是没有暗示这次会谈的性质。

【德新社巴黎四月七日电】南越一度的国家元首杨文明将军说，法国应当采取外交步骤

帮助通过谈判解决南越的冲突。

杨文明（他一九六三年推翻了吴庭艳政权）在由他的儿子杨明德今天在这里宣读的一项声明中说，由于法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外交地位，法国是适合积极谋求谈判解决并且注意在西贡建立一个“尊重民主原则和国际协议的政权”的唯一国家。

这位南越前“铁腕人物”的儿子来这里

不可能遵守协定，所以要打倒，但不规定只是“阮文绍总统”，而规定为“阮文绍总统及其伙”，这是重要的。就是说，目标不只是阮文绍总统个人，而是阮文绍政权的“新殖民主义”实质。

临时革命政府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六点声明，临时革命政府在这个声明中呼吁设立“新的停战日”和“在三个月内召开和解会议”，重新规定停火，南方当事者双方进行会谈。

军事压力当然也是打倒阮文绍政权以达到这个政治目的。目标虽然是“西贡”，但与其说是占领西贡市莫如说是扫荡“西贡的实体，即西贡政权”。

为了同在法国过流亡生活的南越“第三力量”的代表建立接触。

【法新社巴黎四月七日电】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法国准备在越南两方中间充当“诚实的掮客”以制止战斗，但是不打算独立行动。他说，法国还打算加紧它对越南的人道主义援助。他是在北越大使武文充同克洛德·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会谈后说这番话的。

美驻西贡“使馆”透露

美导弹巡洋舰“长滩号”同在南越海面的舰艇汇合

【美联社西贡四月七日电】尽管五角大楼一再否认，但是，美国第七舰队的船只还是继续在越南沿海附近进行战时集结，与此同时，越共的部队袭击了离西贡不到六英里的地方，而且接连三天来加紧了

在南部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炮击。

美国大使馆透露，导弹巡洋舰“长滩号”已经同停泊在越南沿海附近的也许是二十艘、也许是二十艘以上的航空母舰、驱逐舰、两栖船和补给船汇合。

恩卡拉宣布接管津巴布韦民盟领导并批评卡翁达等人

【法新社索尔兹伯里四月四日电】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埃诺斯·恩卡拉今天提供了迹象表明罗得西亚非洲民族主义阵线可能分裂。他说，他已接管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他说，他成为这个联盟的领袖是由于党的主席西索尔牧师最近重新被捕的结果。

他在一次对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严厉指责中

说，这个联盟及其领导人在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民族主义阵线中已成为“没人要的伙伴”。

他说，看来，其他民族主义分子正在企图“摧毁”这个联盟及其对罗得西亚进行的游击战的努力。为此，这个联盟可能必须“保存自己”，选择不继续参加非洲人全国委员会。

他又说，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卡翁达总统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

【德新社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四月七日电】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今天主持了非洲统一组织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特别部长级会议。

非洲解放组织的四十二名非洲统一组织外长和代表将要讨论南非向黑非洲国家呼吁和解的问题。

他们将设法找出对这个呼吁的*共同答复，有些人对这个呼吁表示*怀疑，另一些人对它抱有希望。

观察家们预料主张和反对同南非对话的那些人之间将进行激烈讨论。

【合众国际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七日电】东道国坦桑尼亚过去曾有助于安排在罗得西亚的和平主动行动，尼雷尔的基调讲话再度要求采取温和态度。

肯尼亚外长韦亚基为强硬派发言，他说，“我们要求在多数人统治实现以前，各国政府对南非进行全面抵制。我们重申我们相信武装斗争，我们除支持解放斗争外，别无他法。”

【法新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七日电】罗得西亚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领导人穆佐雷瓦对代表们说，非洲人全国委员会认识到，除非能和平地实现多数人统治的独立，否则在罗得西亚进行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穆佐雷瓦在开幕会议上讲话时谈到非洲南部当前局势的具体细节。

关于纳米比亚，穆佐雷瓦表示，南非应承认纳米比亚的自治。

他接着呼吁莫桑比克政府尽一切力量孤立罗得西亚的白人少数。

【法新社达喀尔四月七日电】几内亚总统杜尔今晚称同南非的对话是一个“骗局”。据这里收听到的科纳克里电台的广播，杜尔在对两个青年运动发表讲话时说，“斗争是我们必需的东西。”

他说，几内亚完全准备同其他非洲人一起为非洲的完全解放而战斗。

【法新社阿尔及尔四月七日电】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评论今天在达累斯萨拉姆开幕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时，批评了某些非洲国家支持同南非对话的“单方面的倡议”。该报追述说正是在阿尔及利亚的要求下才召开了这个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对付那些只能损害非洲利益的新的阴谋”。

《圣战者日报》问道：“那些寻求同南非种族主义者接触的人是否屈服于经济援助的诺言？”《圣战者日报》接着说，“沃斯特和他所保护的索尔兹伯里的史密斯自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走上了非殖民化进程之后就害怕了。南部非洲形势的发展使得他们在解放力量的军事行动面前变得非常脆弱。通过对话，比勒陀利亚只不过是使各解放运动失去作用和摆脱它在国际上所陷入的孤立处境。向它伸出手就是上那些涣散人心的力量的当和给大陆全部解放刹车。”

* 照顾在罗得西亚进行一项出卖交易。”

【法新社索尔兹伯里四月四日电】史密斯总理今晚说，罗得西亚政府已决定让被监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西索尔参加下周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

史密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时说，他应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领导人穆佐雷瓦、四个非洲国家的总统和南非政府的要求已同意释放西索尔。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

阿尔及利亚报纸批评一些非洲国家同南非对话

法报新道

布朗关于美可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讲话

增加了美国首都的混乱状况

迅速减少了他对西贡政府的抵抗能力的估计，把抵抗能力的估计从三、四个月减少到六个星期，最后减少到几天。

这里的观察家们说，美国武装部队的这位高级官员谈到的关于美国要对越南进行军事干涉的说法只会增强大多数国会议员要以任何代价阻止这一行动的决心。

(上接第一版)

联系到这一点，一件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可能因为新岁将临，日本出的漂亮月份牌吸引

中嶋岭雄访问
中苏蒙的观感

了许许多多的人。苏联是一个SOCIALISM FOR WAITING (什么事都要等待的社会主义) 的国家，所以，这次我旅行时苏联旅行社的接待情况也不例外，有许多事情我都必须忍气吞声地等待。可是，如果你有日本出的月份牌，那么事情就会非常顺利地办成。日本不愧为经济动物，各大公司似乎都送来了大批专门供应苏联的大型漂亮月份牌。我在机场碰巧目睹了一个场面：某有名公司的出差人员拎来了一大捆印着半裸体女人像的大型月份牌，在机场休息的时候，一直被机场女招待包围着，索要月份牌。

这个事例说明，从现象来看，今天的苏联社会随处表现出了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倾向，尽管我不完全赞同中国现在对它的批判。勃列日涅夫一开始演讲，老百姓就马上把电视机关掉，这种现象似乎已不值得吃惊。正因为这种向往西方和脱离意识形态的倾向存在于社会的底部，所以令人觉得，今天，苏联的领导人虽然感到原则和真心话的不合，却还在加强作为原则的意识形态的说教。克里姆林学家分析说，军方和克里姆林宫内部的鹰派正在增强其势力；这个分析在这一点上或许是说对了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知识分子不言而喻是十分苦恼和惶惶然不知所措的。因此，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发表的作品在莫斯科大学的许多学生中间传阅，大概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

就反体制知识分子而言，人们对科学家萨哈罗夫、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等在严加控制的情况下留在苏联的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同情，似乎也是意外地广泛的。

本来，索尔仁尼琴也好，萨哈罗夫博士也好，罗伊·麦德维杰夫也好，这些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把今天的中国看成是他们正好要最激烈地批判的斯大林时代在中国的翻版。这一点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迥然不同，因为我国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同情苏联的这批反体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企图从中国今天的发展方向中找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不待说，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家都认为今天的中国是斯大林时代在中国的翻版。可是，也有必要指出，在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家中，也存在着两股批判中国的潮流：一股站在拥护现制度的立场上从制度上批判中国；另一股企图比较自由地而且带有学术性地批判中国，同时对于苏联政府在索尔仁尼琴事件和捷克事件上的立场持批判的态度。

三、蒙古社会主义的现实

位于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蒙古社会的状况，尽管日本人浪漫地幻想成什么草原、蒙古包，什么游牧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都令人感到是非常严酷的。日本人对蒙古的看法相当地含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但是我回国后，某报社一位老练的记者问道：“蒙古是苏联领土吗？”对此我感到有些惊讶。

生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严酷的一个背景大概是，尽管激烈地谴责毛泽东而卖力地颂扬勃列日涅夫成了今天蒙古的基本外交方针，但是苏联在这个国家的渗透力量大得太过分了。且不说在乌兰巴托市内行走的外国人几乎全是俄国人，就是进驻蒙古的苏联兵也太过分地刺眼。在这一点上，“蒙古是苏联领土吗？”这个问题，虽然有讽刺的意思，却也可以说是正中要害的。比方说，和中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等比较，人们好说“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从现象上看问题，这个评价至少是不能不令人赞同的。蒙古人曾经长期受汉人的统治，却一直顽固地拒绝被引进汉字文化圈；而今天，却令人觉得他们放弃蒙古文字，非常简单地进入了俄罗斯文字的世界。对这个事实，该怎样认识才好呢？

目前，除了据说约有六千名中国人（旅蒙华

《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

侨) 住在乌兰巴托以外，中国的影子等于一点也没有（据说，在整个蒙古，居住着一万二千到二万名中国人），剩下的就是中国大使馆和为这些中国人每星期出版一次的中文报纸《蒙古消息报》。除了这些外，我仅仅看到，乌兰巴托市内不多几家书店中的一家的招牌是用蒙文、俄文、英文和中文写的，写了一个“书”字。另一方面，在历史博物馆里，反映清朝统治的残暴性的生动的绘画和颈枷、脚镣一起陈列着；老百姓指着中国在修建过程中停止了援助的百货公司谴责中国背信弃义。说来是独立以来的反清反汉感情在中苏、中蒙对立以后又和反对今天的中国的行动结合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对留在那里的人的感情似乎是冷淡的，许多中国人被迫过着最下层的生活。

但是，苏联的影响却渗透到一切领域。去年十一月建国五十周年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前往祝贺，彼此重申了苏蒙友谊。就在这个蒙古，一般民众对苏联是怎样看的呢？一个旅行者向蒙古人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能指望得到有个性的回答的。但是，一般民众对苏联也未必怀有良好的感情。举个例子说，我到理应和苏联的旅行社对口合作的国营旅行社的办公室去，请他们帮助办理涉及苏联的业务，立即遭到了拒绝；海关官员对苏联兵的检查使人感到很严，显然不同于对蒙古人的检查。这些情况使我可以推测他们对苏联的感情未必是好的。

还有，在蒙古，人们特别关心日本，对日本寄予希望，对美国的关心也在增加。从这种情况中大概也可以作某种程度的推测。难道蒙古的民众企图在这种方向上去挣脱夹在中苏两国之间的严酷命运吗？也许是由于赤裸裸的对华坏感情，对日感情似乎已经大大好转，他们慎重地不愿意谈论诺门坎事件（一九三九年）的恶梦。蒙古的一位女知识分子说：“蒙古人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领袖。我们强烈地希望同日本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年轻人中间日语热在高涨，似乎是反映了这样的风潮。至于美国，只有一些集体游客为了观赏夏日草原风光而例外地来这个国家访问；可是，有一个傍晚，在乌兰巴托饭店空空荡荡的餐厅里，顾客不满十人，舞台上却出现了乐队，演奏的尽是爵士乐。我为这个场景感到惊讶。我想，如果这个国家进一步打开和日本交往的渠道，也开始和美国交往，到那时，这里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啊！

固然，在现阶段，蒙古和西方交流的渠道是狭窄的。即使是已建交的我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去访问，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我在莫斯科取得蒙古人入境签证时，先要填一张表，上面开列了一长串调查项目，其中一项问道：“有何关于蒙古的著作？何时载于何刊物？”我事先在一定程度上想象过人员往来的大门是难开的，可是到了蒙古才知道，饭店门口整天都站着哨兵，桌子上就写有多达二十二条的注意事项。

由于这样的状况，对使用照相机的限制也就格外地严格。我在入境时，在海关就因为照相机而遇到了麻烦；可是，似乎不单单对我这么严，连应蒙古政府的邀请前来的外国记者也受到同样的待遇，而且，甚至以介绍蒙古的学者闻名于世的欧文·拉铁摩尔教授也不能拍摄“未加装点的蒙古”，譬如市内的星期日露天市场、乌兰巴托市周围密密层层的蒙古包，等等。偏偏是这个星期日露天市场才如实地反映了蒙古人的生活。在寒冷的天空下，人们在这个市场上熙来攘往。这里全部是露天摊子，旧木板上放着几样诸如空瓶、单只靴子、旧打火机、手制笤帚、小工具之类东西。到市内唯一的百货公司、肉店和杂货店去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消费生活的贫乏程度。

诚然，针对生活方面这样贫乏的状况，中国方面经常谴责说，苏联的“剥削”造成了经互会成员国蒙古的贫穷。对这个谴责的评价暂且不

说，发展中的蒙古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劳动力不足，这个问题是由在差不多的我国国土的四

五倍的面积上只有大约

一百三十万总人口的状况造成的。和实行着彻底的人口控制政策的中国正相反，这个国家似乎在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和颁发奖金的办法拼命地实行人口增长政策。市内的主要建筑物，许多是由被拘留的日本人建设起来的。现在，城市建设正在渐渐进行，教育事业正在努力发展，学生和教师受到优待。这些状况确实将给这个国家的未来带来光明的希望。

对于蒙古，我作为一个外行想了解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评价成吉思汗，以及有关大蒙古主义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喇嘛教的现况。目前，在一切意义上说，苏联似乎正在实行不使民族主义在蒙古抬头的领导，对成吉思汗作了完全否定的估价。关于这一点，泽登巴尔现政权也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围绕着是否纪念成吉思汗八百年诞辰，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图木尔奥其尔等人被作为民族主义分子而撤了职。我曾试图向乌兰巴托大学学生询问青年对成吉思汗的看法，但他们只回答说“他是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统治者”。

我试着“挑衅”地提问说：“在中国，现在不仅称赞秦始皇，而且还把成吉思汗当作中国的历代英雄来看待，不是吗？”即使如此，得到的回答仍然一样。即使问到情节壮观、韵文优美以及据称也是蒙古民族道德规范的民族典籍《元朝秘史》，他们也枯燥无味地说要作为分析当时社会结构的史料来对待。这实在是公式化的反应。翻开这个国家的革命史一看，就可以了解，尽管苏联方面下了最新的定义说“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同情共产国际的组织”，人民革命党本身却总是被当作大国的牺牲品，同时在革命主体内部又是从成立那天起，经过乔巴山独裁时代，直到今天的泽登巴尔体制，不断进行激烈的党内斗争和清洗。这样的过程，总象深藏在心里一样，我们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我得知在市中央的科学院的漂亮建筑物的正面耸立着斯大林的巨大铜像后，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斯大林像仍然这样耸立着的地方，恐怕只有阿尔巴尼亚和蒙古了吧）。布里亚特蒙古人扎不斯朗，是应该和蒙古革命英雄苏赫巴托尔相提并论的革命家之一，也是创建了科学院的学者，今天被扣上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受着批判。与此相对照，科学院正面至今还耸立着斯大林像。在我读过的我国介绍蒙古的书里，这个事实都被小心翼翼地割爱了。总之，对蒙古来说，目前应该追求的东西，难道不可说正是新的民族主义吗？

关于喇嘛教，情况似乎多少有点不同。平民的葬礼似乎还有喇嘛到场。在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飞机上，有一位蒙古青年送给我一本蒙古佛教协会一九六一年发行的有名的喇嘛庙庆宁寺的画册和一个喇嘛教色彩极浓的护身符，说是留作友谊的纪念。这位青年可能是虔诚的喇嘛教徒。星期日，我访问了市内的庆宁寺，看见喇嘛们打开藏文的经书在专心读经，中年的妇女在祈祷。喇嘛教在这里并没有死亡，这一点似乎是肯定无疑的。

四、越过中苏对立下的边界

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上午十一点从乌兰巴托发车。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左边就看到无线电天线的基地，以后直到边界，到处都有抛物面天线的基地、雷达基地、各种军事基地，到处都驻有苏联军队，使人感到中苏军事关系的部分现实。还有，在那来哈、马尼特、乔依尔、赛音山达等比较大的车站的附近，或者在草原上，都有苏制军用卡车在行驶。戈壁沙漠上空也经常有小型飞机在盘旋。到北京之后才弄到手的新杂志《历史研究》创刊号上登载了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章，是史宇新写的《驳斥造谣者——论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文章说，中国强烈呼吁苏联撤走它驻蒙古的军队，停止向中国派遣间谍。从我亲眼目睹的现实来说，我觉得中国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有根据的。

(待续)

(上接第一版)

联系到这一点，一件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可能因为新岁将临，日本出的漂亮月份牌吸引

中嶋岭雄访问
中苏蒙的观感

了许许多多的人。苏联是一个SOCIALISM FOR WAITING (什么事都要等待的社会主义) 的国家，所以，这次我旅行时苏联旅行社的接待情况也不例外，有许多事情我都必须忍气吞声地等待。可是，如果你有日本出的月份牌，那么事情就会非常顺利地办成。日本不愧为经济动物，各大公司似乎都送来了大批专门供应苏联的大型漂亮月份牌。我在机场碰巧目睹了一个场面：某有名公司的出差人员拎来了一大捆印着半裸体女人像的大型月份牌，在机场休息的时候，一直被机场女招待包围着，索要月份牌。

这个事例说明，从现象来看，今天的苏联社会随处表现出了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倾向，尽管我不完全赞同中国现在对它的批判。勃列日涅夫一开始演讲，老百姓就马上把电视机关掉，这种现象似乎已不值得吃惊。正因为这种向往西方和脱离意识形态的倾向存在于社会的底部，所以令人觉得，今天，苏联的领导人虽然感到原则和真心话的不合，却还在加强作为原则的意识形态的说教。克里姆林学家分析说，军方和克里姆林宫内部的鹰派正在增强其势力；这个分析在这一点上或许是说对了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知识分子不言而喻是十分苦恼和惶惶然不知所措的。因此，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发表的作品在莫斯科大学的许多学生中间传阅，大概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

就反体制知识分子而言，人们对科学家萨哈罗夫、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等在严加控制的情况下留在苏联的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同情，似乎也是意外地广泛的。

本来，索尔仁尼琴也好，萨哈罗夫博士也好，罗伊·麦德维杰夫也好，这些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把今天的中国看成是他们正好要最激烈地批判的斯大林时代在中国的翻版。这一点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迥然不同，因为我国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同情苏联的这批反体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企图从中国今天的发展方向中找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不待说，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家都认为今天的中国是斯大林时代在中国的翻版。可是，也有必要指出，在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家中，也存在着两股批判中国的潮流：一股站在拥护现制度的立场上从制度上批判中国；另一股企图比较自由地而且带有学术性地批判中国，同时对于苏联政府在索尔仁尼琴事件和捷克事件上的立场持批判的态度。

三、蒙古社会主义的现实

位于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蒙古社会的状况，尽管日本人浪漫地幻想成什么草原、蒙古包，什么游牧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都令人感到是非常严酷的。日本人对蒙古的看法相当地含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但是我回国后，某报社一位老练的记者问道：“蒙古是苏联领土吗？”对此我感到有些惊讶。

生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严酷的一个背景大概是，尽管激烈地谴责毛泽东而卖力地颂扬勃列日涅夫成了今天蒙古的基本外交方针，但是苏联在这个国家的渗透力量大得太过分了。且不说在乌兰巴托市内行走的外国人几乎全是俄国人，就是进驻蒙古的苏联兵也太过分地刺眼。在这一点上，“蒙古是苏联领土吗？”这个问题，虽然有讽刺的意思，却也可以说是正中要害的。比方说，和中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等比较，人们好说“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从现象上看问题，这个评价至少是不能不令人赞同的。蒙古人曾经长期受汉人的统治，却一直顽固地拒绝被引进汉字文化圈；而今天，却令人觉得他们放弃蒙古文字，非常简单地进入了俄罗斯文字的世界。对这个事实，该怎样认识才好呢？

目前，除了据说约有六千名中国人（旅蒙华

《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

侨) 住在乌兰巴托以外，中国的影子等于一点也没有（据说，在整个蒙古，居住着一万二千到二万名中国人），剩下的就是中国大使馆和为这些中国人每星期出版一次的中文报纸《蒙古消息报》。除了这些外，我仅仅看到，乌兰巴托市内不多几家书店中的一家的招牌是用蒙文、俄文、英文和中文写的，写了一个“书”字。另一方面，在历史博物馆里，反映清朝统治的残暴性的生动的绘画和颈枷、脚镣一起陈列着；老百姓指着中国在修建过程中停止了援助的百货公司谴责中国背信弃义。说来是独立以来的反清反汉感情在中苏、中蒙对立以后又和反对今天的中国的行动结合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对留在那里的人的感情似乎是冷淡的，许多中国人被迫过着最下层的生活。

但是，苏联的影响却渗透到一切领域。去年十一月建国五十周年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前往祝贺，彼此重申了苏蒙友谊。就在这个蒙古，一般民众对苏联是怎样看的呢？一个旅行者向蒙古人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能指望得到有个性的回答的。但是，一般民众对苏联也未必怀有良好的感情。举个例子说，我到理应和苏联的旅行社对口合作的国营旅行社的办公室去，请他们帮助办理涉及苏联的业务，立即遭到了拒绝；海关官员对苏联兵的检查使人感到很严，显然不同于对蒙古人的检查。这些情况使我可以推测他们对苏联的感情未必是好的。

还有，在蒙古，人们特别关心日本，对日本寄予希望，对美国的关心也在增加。从这种情况中大概也可以作某种程度的推测。难道蒙古的民众企图在这种方向上去挣脱夹在中苏两国之间的严酷命运吗？也许是由于赤裸裸的对华坏感情，对日感情似乎已经大大好转，他们慎重地不愿意谈论诺门坎事件（一九三九年）的恶梦。蒙古的一位女知识分子说：“蒙古人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领袖。我们强烈地希望同日本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年轻人中间日语热在高涨，似乎是反映了这样的风潮。至于美国，只有一些集体游客为了观赏夏日草原风光而例外地来这个国家访问；可是，有一个傍晚，在乌兰巴托饭店空空荡荡的餐厅里，顾客不满十人，舞台上却出现了乐队，演奏的尽是爵士乐。我为这个场景感到惊讶。我想，如果这个国家进一步打开和日本交往的渠道，也开始和美国交往，到那时，这里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啊！

固然，在现阶段，蒙古和西方交流的渠道是狭窄的。即使是已建交的我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去访问，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我在莫斯科取得蒙古人入境签证时，先要填一张表，上面开列了一长串调查项目，其中一项问道：“有何关于蒙古的著作？何时载于何刊物？”我事先在一定程度上想象过人员往来的大门是难开的，可是到了蒙古才知道，饭店门口整天都站着哨兵，桌子上就写有多达二十二条的注意事项。

由于这样的状况，对使用照相机的限制也就格外地严格。我在入境时，在海关就因为照相机而遇到了麻烦；可是，似乎不单单对我这么严，连应蒙古政府的邀请而来的外国记者也受到同样的待遇，而且，甚至以介绍蒙古的学者闻名于世的欧文·拉铁摩尔教授也不能拍摄“未加装点的蒙古”，譬如市内的星期日露天市场、乌兰巴托市周围密密层层的蒙古包，等等。偏偏是这个星期日露天市场才如实地反映了蒙古人的生活。在寒冷的天空下，人们在这个市场上熙来攘往。这里全部是露天摊子，旧木板上放着几样诸如空瓶、单只靴子、旧打火机、手制笤帚、小工具之类东西。到市内唯一的百货公司、肉店和杂货店去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消费生活的贫乏程度。

诚然，针对生活方面这样贫乏的状况，中国方面经常谴责说，苏联的“剥削”造成了经互会成员国蒙古的贫穷。对这个谴责的评价暂且不

说，发展中的蒙古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劳动力不足，这个问题是由在差不多的我国国土的四

五倍的面积上只有大约

一百三十万总人口的状况造成的。和实行着彻底的人口控制政策的中国正相反，这个国家似乎在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和颁发奖金的办法拼命地实行人口增长政策。市内的主要建筑物，许多是由被拘留的日本人建设起来的。现在，城市建设正在渐渐进行，教育事业正在努力发展，学生和教师受到优待。这些状况确实将给这个国家的未来带来光明的希望。

对于蒙古，我作为一个外行想了解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评价成吉思汗，以及有关大蒙古主义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喇嘛教的现况。目前，在一切意义上说，苏联似乎正在实行不使民族主义在蒙古抬头的领导，对成吉思汗作了完全否定的估价。关于这一点，泽登巴尔现政权也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围绕着是否纪念成吉思汗八百年诞辰，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图木尔奥其尔等人被作为民族主义分子而撤了职。我曾试图向乌兰巴托大学学生询问青年对成吉思汗的看法，但他们只回答说“他是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统治者”。

我试着“挑衅”地提问说：“在中国，现在不仅称赞秦始皇，而且还把成吉思汗当作中国的历代英雄来看待，不是吗？”即使如此，得到的回答仍然一样。即使问到情节壮观、韵文优美以及据称也是蒙古民族道德规范的民族典籍《元朝秘史》，他们也枯燥无味地说要作为分析当时社会结构的史料来对待。这实在是公式化的反应。翻开这个国家的革命史一看，就可以了解，尽管苏联方面下了最新的定义说“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同情共产国际的组织”，人民革命党本身却总是被当作大国的牺牲品，同时在革命主体内部又是从成立那天起，经过乔巴山独裁时代，直到今天的泽登巴尔体制，不断进行激烈的党内斗争和清洗。这样的过程，总象深藏在心里一样，我们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我得知在市中央的科学院的漂亮建筑物的正面耸立着斯大林的巨大铜像后，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斯大林像仍然这样耸立着的地方，恐怕只有阿尔巴尼亚和蒙古了吧）。布里亚特蒙古人扎不斯朗，是应该和蒙古革命英雄苏赫巴托尔相提并论的革命家之一，也是创建了科学院的学者，今天被扣上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受着批判。与此相对照，科学院正面至今还耸立着斯大林像。在我读过的我国介绍蒙古的书里，这个事实都被小心翼翼地割爱了。总之，对蒙古来说，目前应该追求的东西，难道不可说正是新的民族主义吗？

关于喇嘛教，情况似乎多少有点不同。平民的葬礼似乎还有喇嘛到场。在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飞机上，有一位蒙古青年送给我一本蒙古佛教协会一九六一年发行的有名的喇嘛庙庆宁寺的画册和一个喇嘛教色彩极浓的护身符，说是留作友谊的纪念。这位青年可能是虔诚的喇嘛教徒。星期日，我访问了市内的庆宁寺，看见喇嘛们打开藏文的经书在专心读经，中年的妇女在祈祷。喇嘛教在这里并没有死亡，这一点似乎是肯定无疑的。

四、越过中苏对立下的边界

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上午十一点从乌兰巴托发车。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左边就看到无线电天线的基地，以后直到边界，到处都有抛物面天线的基地、雷达基地、各种军事基地，到处都驻有苏联军队，使人感到中苏军事关系的部分现实。还有，在那来哈、马尼特、乔依尔、赛音山达等比较大的车站的附近，或者在草原上，都有苏制军用卡车在行驶。戈壁沙漠上空也经常有小型飞机在盘旋。到北京之后才弄到手的新杂志《历史研究》创刊号上登载了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章，是史宇新写的《驳斥造谣者——论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文章说，中国强烈呼吁苏联撤走它驻蒙古的军队，停止向中国派遣间谍。从我亲眼目睹的现实来说，我觉得中国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有根据的。

(待续)